

外论摘编

[编者按]《拉丁美洲透视》是由美国著名左翼政治学者罗纳德·奇尔科特创办的双月刊，创刊40多年来深受美国和拉美进步读者的欢迎。鉴于该刊读者非常关心中拉关系的发展对拉美国家的影响，该刊主编奇尔科特策划出版了长达200页的中拉关系特刊。其中理查德·哈里斯的《理解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研究笔记》是特刊中内容最全面的一篇。他在文中反驳了西方社会一些歪曲、诽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拉美政策的观点。

理解中国与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的关系*

——研究笔记

理查德·L·哈里斯

内容提要：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领袖一直关注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致力于创造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有利于建立新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国际环境，追求世界和平与合作，反对霸权主义、极端不平等和战争。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中国政治领袖致力于发展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长期经济和政治合作。

关键词：中国 拉美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者简介：理查德·L·哈里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蒙特利海湾分校全球研究荣休教授，自1977年以来一直担任学术刊物《拉丁美洲透视》的联合主编，自2007年以来担任《发展中社会研究》的执行主编。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6)02-0145-11

* 本文译自 Richard L. Harris, "Understand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Research Notes",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2, No. 6, November 2015. 本译文的发表已获版权方和作者授权。

中国政治领袖认为中国正处于当今世界体系发生历史性转型的焦点，他们正努力抓住这一历史性时刻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带来的机遇（Huang, 2013）。在他们看来，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耻辱使中国丧失了历史性的伟大复兴机会（Wang, 2012; Zhu, 2015）。他们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可操作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建立一个基于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新的多极世界秩序，而非基于霸权、极端不平等和战争的旧秩序。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制定的。

一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政策

中国领导人对中拉关系的认识充分体现在中国外交部2008年11月5日发布的《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这份重要文件阐明了中拉关系的战略框架和政策目标，揭示了中国政治领袖们如何看待全球化、当今世界秩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更精确地说，即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性关头的中拉关系。这份文件还提出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明确了五大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具体政策目标，阐释了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政策目标力图“增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全面合作关系”（PRC, 2012）。这份官方文件开篇揭示了中国对外关系所依据的基本主张：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形势下，中拉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制定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旨在进一步明确中国对该地区政策目标，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中拉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推动中拉关系继

续健康稳定全面发展。

这些段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如何描述当前国际事务及其所称的人类共同愿望，也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被视作“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面向国际社会的“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秩序）”。该政策文件前言也表明中国领导人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看作“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PRC，2012）

这份政策文件旨在明确 2008 年 11 月中旬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哥斯达黎加、古巴和秘鲁三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目标。这份政策声明展示了中国对拉美关系的目标，具体如下（PRC，2012）：

互尊互信、扩大共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拉美各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断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对话和沟通，扩大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互利共赢、深化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同拉美国家成为互利互惠的经贸合作伙伴，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互鉴共进、密切交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相互学习有益经验，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赞赏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中国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拉美各国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

目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有一半位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说服这些国家承认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外交代表。

这份长达 10 页的政策文件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它包含指导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及其地区组织的官方关系的具体目标。因此，就政治关系而言，具体目标是推动中拉领导人高层交往，促进立法机构、政党和地方机构之间的交流，建立政治和商业磋商机制，加强合作和协调，增强联合国的作用以推动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后几项目标事关中国的战略目标，即争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合作，以改革由美国和 G7 集团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

主导的当前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特征是霸权主义、缺乏代表性和不公平。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国政府在其外交政策声明、海外媒体通报及大多数国际政治场合中都曾予以明示（Zhu, 2015）。

维护和平及坚持和平发展这一经常提出的主张，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国外交关系的一项战略和基本目标。中国领导人相信，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有赖于和平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这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最佳战略（Zhu, 2015）。中国人民和政治领导人都深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荣，2014年6月中国举行了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庆祝活动，重申将不遗余力地继续信守这一承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就各自与西藏关系进行谈判之时。1953年12月31日，当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并开始谈判时，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些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历任政治领导人都接受了这五项原则，因其具有巨大的道德影响力和战略灵活性。1982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载入宪法，中国继续援引它们作为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依据，尤其是在谴责和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干涉主义行径时（Chen, 201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互不干涉和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在今天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不仅要面对西藏和新疆的分裂主义，还要面对外国势力对中国处理这些威胁其领土完整的方式所提出的批评。中国领导人和媒体利用其长期信奉的互不干涉和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驳斥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批评，同时也反对外国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当前同菲律宾、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岛屿纷争以及南海海洋边界纠纷中，中国也援引这些原则，并明确宣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占领这些岛屿（Yujuico, 2015）。

中国对拉美政策文件表明，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官员在制定和执行中国对拉美政策时将继续奉行这一指导性框架。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这份政策文件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宣传文件（尽管它有宣传价值），而更多的是一份相对全面地阐释中国对拉美关系的政策目标和指导路线的政府公告。这份重要的政策文件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被视作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希望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视作南南合作和双赢合作，而不是被中国多次明确拒绝的一种霸权主义的南北关系和掠夺关系的中国版本。就此而言，中国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中发挥着领导作用，目的是推进其旨在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战略（Mishra, 2014）。

二 政治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对外关系

中共领导人仍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世界。罗兰·博尔（Roland Boer, 2014）争辩说，“要理解现代中国，就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大多数外国观察家并不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果往往无视或者不承认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因素。当然，一些进步的外国评论家和学者也曾努力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Ware, 2013），但这需要认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同时还要认识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企业家并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

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信奉和坚守。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经济改革的正确依据是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与相对发达的文化、社会主义体制之间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Sun, 1995）。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认为，经济改革对于实现生产力现代化，快速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建设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常必要的。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Chan, 2003: 187 - 188）。自2012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习近平就主张党的领导层和政府高级官员应当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Boer, 2014; Huang, 2015）。此外，他还在多个重要场合公开重申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

《中国日报》曾报道，2012年1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习近平主持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倍加努力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呼吁“全党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继续表示：

中外人士正密切关注着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初步举措，这次学习和执行十八大精神的会议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十八大报告勾画了中国的发展蓝图，即在新的条件下，完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赢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十八大报告既是政治宣言书，又是我党的行动指南，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次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还强调指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通过长期实践获得的根本成就，

是团结党和人民、努力奋发、夺取胜利的旗帜……应当高举这面旗帜，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被视作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融合……共产党员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现实，即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需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又需要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既需要市场关系，又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来调节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中共领导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央计划和自由市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要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继续增强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中国日报》，2013年）。

习近平一再号召全党“要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日报》，2012年）。习近平主席和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反腐败运动，已经逮捕了一批在中央政府、国有企业、省政府和军队任职的高级领导干部。习近平认为，腐败、党性原则的弱化、缺乏党纪政纪，构成了对中国共产党连续执政的最大威胁（Sanderson and Shi, 2014）。

对习近平公开言论的粗略回顾也能发现，他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历史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但这不再是按照陈旧的冷战世界观的划分。习近平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相信，两个阵营除了共存之外没有其他理性选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和平道路，汲取资本主义的长处，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Sanderson and Shi, 2014）。

虽然中国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了其世界观和政治战略，但中国政府在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时并没有严格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的官方立场是“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当在世界上和谐共处”，因此“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在真诚、友好、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Aho, 2011）。

然而，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及世界其他地方），有一点是清楚无疑的：中国同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古巴、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左翼

执政国家有着更加友好互助的关系，因为左翼政治理想更接近中国领导人的思想（Alvaro and Minay, 2015），而同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由亲美保守政权领导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当然，中国同大多数继续与台湾地区保持“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目前有数量相当多的、内容不断演变的有关当代中国的批判性左派文献是由中国境内外批评者发表的。这些批判性文献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同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左派之间批评中国的焦点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源于批评者的具体意识形态，如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批评性观点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批评意见有些基本上是建设性的，甚至充满乐观态度，但大多数是负面或敌对的。安德烈·弗尔特切克（Andre Vltchek, 2014: 3-4）指责西方左派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和古巴）怀有偏见和敌意。

弗尔特切克认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只有西方设计和实施的东西值得信任”，“西方左派的傲慢和自以为是令人愤怒，结果目前在欧洲、北美的左翼运动和中国之间的建设性工作关系非常少。”弗尔特切克表示，“欧洲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并不够左，但这是胡扯——问问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国是否社会主义，问问委内瑞拉或南非政府吧。……其实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左派的国际主义并不充分，或者根本没有国际主义，而国际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大卫·科恩（David Cohen, 2014a）是中国“新左派”的一位颇为博学的观察家，他认为“新左派和自由派（新自由派）之间的学术辩论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进程的一部分，这些辩论看来扩展了中国最高决策者的思路和政策选择”。一些观察家认为，习近平主席最近的讲话及党报党刊和媒体对其讲话的官方解读表明，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影响（Cohen, 2014a），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推动的轰轰烈烈并日益扩大的党内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反腐败运动（Cohen, 2014; Huang, 2013）。

三 中国、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

尽管中国政治领导人承认全球化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但他们相信它本质上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过程。他们认为，和市场关系一样，全球化并不必然只有一种阶级属性。虽然全球化过程当前是由新自由主义和跨国企业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但他们相信中国可以通过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全球化过程，利用这一过程最有益的成分（比如发达技术的传播、外国资本

的投入和世界贸易的扩张等)来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CPC, 2012; Hu, 2012; Huang, 2013, 2015)。

中国政治领导人认为,在当前国际事务的历史性关头,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是成功和有效的。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此予以明确阐述。这次重要的高级别工作会议的目标是明确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和主要使命(新华网,2014年)。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告诫参会的党政高级官员,中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国梦(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不过他强调,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对外政策的压倒性目标仍然是“促进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

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认为成功地奉行这些外交政策目标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使中国能够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 (1)到2020年,即在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到本世纪中叶,即在全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华网,2014年)。

在这次重要的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了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时奉行双赢合作战略的重要性:“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新华网,2014年)就此而言,需要承认的重要一点是,推行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相对立的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战略,其目的是将中国的外交关系同奉行竞争的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区别开来。这也是以中共领导人关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性质为依据的。他们认为,在日益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里,互惠互利的合作是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所需要的。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后的经济衰退期间良好的经济表现,增强了中共领导人对其战略的信心和他们关于全球化将导致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信念。比如,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公开声称他相信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并称对中国“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国家”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而开始怀疑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资本主义终极理论动摇了,社会主义发展出现奇迹,西方国家遭遇挫折、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信任危机,自信心也动摇了。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公开或暗自比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道路。”

不过,中国政治领导人也认为中国必须避免同美国爆发严重冲突(Knight, 2008: 102 - 103),并且必须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以建立一个真正

代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利益的多极世界秩序。比如，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对欧洲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讲话中表示：“今天的世界上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即多极合作与和平对世界霸权和战争。”（Zhao, 2014）他向听众解释说，中国从不称霸，“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追求和平植根于中国的民族性格。中国从来没有对外殖民和侵略，也没有在海外拥有军事基地。中国同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均奉行友好的外交政策。”他将中国的外交关系同美国的外交关系相比照，直指美国在对外关系上奉行“掠夺性资本主义”和“追求超额利润”。习近平提醒欧洲听众，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相反，中国在外国既没有军事基地，也不发动对外战争，而“华尔街给世界制造了2008年金融危机”（Zhao, 2014）。

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就世界政治的长期趋势大体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多极化趋势；第二，全球化趋势；第三，和平与发展趋势；第四，国际制度改革趋势；第五，亚太地区愈加繁荣趋势。”（Chen, 2014）基于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中国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多极合作和世界和平模式，终将战胜美国及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盟友奉行的世界霸权和战争模式。中国寻求从发展中国家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来支持这种新的国际秩序模式。如同中国2008年对拉美政策文件明确表明的那样，这是它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目标。

四 最后的思考

正如朱志群（2015）所指出的那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平与发展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战略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发起了新的战略，其基点就是西方技术和外国投资被“引进来”的政策和中国投资与贸易走向全球的“走出去”政策。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包括捍卫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创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促进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Zhu, 2015）。这些目标是中国寻求推动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特别是同中国拥有共同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权进行长期经济合作与政治团结的主要动因。

（翻译 郭存海；校对 施辉业；责任编辑 黄念）